

美国是个极重视个人信用的国度,可以说,推荐人是在以自己的信用为被推荐人“担保”,所说的话,分量自然不轻。一封有力的推荐信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一封推荐信而得到工作、被学校录取、拿到奖学金的例子比比皆是。

## 美国：“万能”的推荐信

在美国,申请学校、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求提供推荐信。

推荐信一般是熟悉你的人,从第三者的角度对你加以评判,因此,和你自己的陈述相比,往往更客观。

美国是个极重视个人信用的国度,可以说,推荐人是在以自己的信用为被推荐人“担保”,所说的话,分量自然不轻。一封有力的推荐信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一封推荐信而得到工作、被学校录取、拿到奖学金的例子比比皆是。

出国留学的人都找人写过推荐信,美国的每所大学都要这个东西,一封两封还打发不了,通常要求提供3封以上。推荐信是“准留学生”准备文件时最头疼的一项。国内的专家、教授即使答应推荐你,也大多只是在信上签个字而已,信件的内容要你自己准备。以第三者的口气,用外语将自己变着法儿地吹捧3次,绝对不是“小菜一碟”。

等到申请绿卡时,对推荐信的要求就更绝了,需要提供6封以上不说,其中还必须至少包封一封“独立推荐信”,让没和你一起工作过,对你并不熟

悉的专家学者来写,证明你如何杰出、美国如何离不开你。这个甚没道理的规定,不知使多少“准移民”望而却步。

在美国读书,平时一定要和导师搞好关系,因为他不仅管着你的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的未来,继续深造、就业、申请绿卡……只要需要推荐信,你就难免有求于他。

有个朋友读博士读到一半时,老婆怀孕了,母亲在国内生病住院,经济压力一下增加了许多。这位朋友私下跑到一个公司去应聘,职位、待遇什么的都谈好了,万事俱备,就差他导师的一封推荐信。朋友和导师正式谈起这件事时,导师正需要人手干活,听说他要走,很不高兴,在他的百般央求之下写了推荐信,可公司收到这封信后就变了卦,表示不再需要他了。

朋友后来和导师闹得不可开交,坚决要求拿个硕士学位就走人。后来闹到系里去,硕士学位最终拿到了,可在找工作时却因为没推荐信而颇费周折,最后总算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份起薪很低的工作。

许多机构要求写推荐

信的人直接将推荐信寄去,里面是褒是贬,被推荐的人并不知道。

多年前发生了震惊中美卢刚校园杀人案,卢刚杀导师的原因之一,据说就是他去应聘一份工作未能成功,因此怀疑导师在推荐信里写了不利于他的话。案发后,那个用人单位公开了那封推荐信,里面其实充满了对卢刚的溢美之词。

推荐信这个规定,并不仅仅针对外国人,而是美国的“普遍规定”。美国高中生申请读大学,需要提供中学老师的推荐信。

每到高中学生申请大学时,老师们就忙得不亦乐乎,要给上百个学生写推荐信。据说,老师们大多备有固定的“格式信”,只是针对不同的学生,修改其中的一些修饰语。

想想也是,如果每封信都单独写,大概得天天坐在那儿,别的一切都别干才行。

### 真真假假的推荐信

有一天,我看到老公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很专心的样子,就随口问了一句:写什么呢?他回答:写推荐信。

啥?又要换工作?搬家?

老公“嘿嘿”一声:想到

哪儿去了,是为实验室里一个技术员写推荐信,他要去读博士。我忍不住笑到:“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也轮到咱给别人写推荐信了。”

仔细想想,我也口头推荐过别人。

开干洗店那阵子,我有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刚刚读完会计本科,四处找工作,因为没有工作经验,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后来她问我,可否在履历表上写上在我的店里做过会计。

这位朋友非常能干,人又好,在国内已有硕士学位,为了找工作才又在国外读了本科。我常说,哪个公司雇了她就偷着乐吧,所以愿意帮她的忙,还把店里的账目给她过目,让她心中有数。

后来的一天,一位先生从银行打来电话,详细询问我那位朋友的工作能力和人品。他问了十几个问题,我自然都给予了极高评价。回答问题的時候我很紧张,比自己去应聘还要紧张,生怕说得不合适,误了朋友的前程。打完电话,老公的手心都是汗。还好,朋友被那个银行聘用,现在已是美国某个银行的财务总监了。

摘自《青年参考》

手,感觉浑身重新充满力量。

第二天,他又回到学校学习。16岁时,布朗获得了苏格兰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的奖学金,成为该校当时年龄最小的大学学生;24岁时,布朗发表了自己所谓的“苏格兰红皮书”,俨然以英国首相的口气对苏格兰的状况进行分析。

这位热心政治的青年,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难免会树立一些反对派。他的对手们常常借他的盲目嘲笑他,攻击他,但他总记得当年哥哥的鼓励。在许多次演讲中,他激昂而自豪地宣称:“我的左眼是上帝为我蒙上的,就是希望我能专注于我学生的事业,专注于我的目标,执著向前!”

眼疾反而加强了布朗奋斗的决心,他迅速在政坛脱颖而出。46岁时,他当上了英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财政大臣,如今他接任布莱尔成为英国最新一任首相。

布朗对青年们说:“每一个经历都在塑造你。我只能坚持信念,保持积极。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在逆境中坚持下去,不让环境去击垮你。”

摘自《中国青年》

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我们的心都碎了。”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枕头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1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天片定药,对我说:“睡吧。”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摘自《武汉晚报》

朋友去内蒙古大草原。

九月末的大草原,已一片冬的景象,草枯叶黄。零落的蒙古包,孤零零地立在路边。朋友的脑中,原先一直盘旋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波澜壮阔,直到面对,他才知道,生活,远远不是想象中那么诗情画意。

主人好客,热情地把他让进蒙古包中。扑鼻的,是哈人的羊膻味,一口大锅里,热气正蒸腾,是白水

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理性程度的标尺。祥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啻是社会的福音。

大约90年前,彼得·德鲁克差不多八九岁的时候,见到了当时已经在欧洲声誉日隆的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再怎么著名的学术巨擘,对于一个八九岁的懵懂孩童来讲,似乎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但是,就是这次一生中,与精神分析大师的惟一见面,在小德鲁克幼稚的心灵中留下了印象。因为父母亲对知识的崇敬之心,小德鲁克深深记住了弗洛伊德。

他的父母是这样对他说的:“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噢,或许说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了。”

八九岁的孩子似乎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小德鲁克反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

## 尘埃里的美好

丁立梅

煮羊肉。怕冷的苍蝇,都聚集到室内来,满蒙古包里乱飞。室内陈设简陋,惟有一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很陈旧的样式了。看不出实际年龄的老夫妻,红红的脸上,是谦和的笑,不住地地让他让座。坐?哪里坐?黑不溜秋的吧毡,就在脚边上。朋友心底的怜悯,滔滔江

水似的,一漫一大片。却在回眸的刹那,被一抹红艳牵住。屋角边,一件说不出是什么的物件上,插着一束花。是康乃馨,朵朵绽放。朋友诧异,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这满眼的枯黄衰败之中,哪里来的康乃馨?主人夫妻笑得淡然而满足,说,孩子送的。孩子在外读大学呢,

我们过生日,他们让邮差送了花来。

那一瞬间,朋友的灵魂受到极大震撼,首先联想到幸福这个词。

我在朋友的故事里微笑着沉默,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美好,它们无处不在。怜悯是对它们的亵渎,而敬畏和感恩,才是对它们最美礼赞。

摘自《每一棵草都会开花》

## 比皇帝更重要的人

他的父亲简捷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比皇帝还重要。”

尽管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粉丝”。尽管时常还会对弗氏的学说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小德鲁克的父母还是不吝誉词,对这位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表示了至高的尊重。与弗洛伊德的见面对小德鲁克日后成为一代管理宗师是否有促进作用,我们无法妄断,不过,父母亲对知识的崇敬之心,对知识分子的景仰之情,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推动着小德鲁克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理性程度的标尺。像祥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啻是社会的福音,因为正是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引领着

大众理性的发展,催生着健全的时代精神。这也正是人们推崇知识分子、神圣化大学校园的原因所在。

与将近100年前的时代状况相比,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有着怎样的进展?两相对照,可能使许多人大为失望。的确,现代的物质状况已经比古希腊甚至一个世纪前大为改善,即便如此,有多少人敢于断言,今人的心智已远远超乎古希腊人呢?

5年前,英国的BBC曾经做过一个由5500名英国民众参加的民意调查,调查公众心目中有史以来“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结果显示,温斯顿·丘吉尔排名第一,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十

位。尽管达尔文、莎士比亚和牛顿分别排在第四、第五和第六名,已经体现了公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应有尊重,但是,在前100位名录中,大卫·贝克汉姆和J·K·罗琳等大众明星有位,诸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罗素等等对英国的思想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顶尖知识分子却皆付阙如。在这份名录中,“皇帝们”仍然高昂着他们的头,占据着极其显著的位置,那些比弗洛伊德更重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享受到“比皇帝还重要”的荣誉。21世纪初5500名英国公众所代表的平均心智,并没有能超出近百年前小德鲁克父母的水准。

持有历史进化论立场的人们,在这种两相对照面前可以休矣。

摘自《南方日报》

## 都不仗义

军阀阎锡山非常吝啬,几乎到了爱钱如命的地步。

1930年,阎锡山和冯玉祥联手反蒋。为了取得军阀石友三的支持,这年3月,阎锡山派参谋长周珉赴河南新乡去拉拢石友三。周珉临行前,阎锡山笑着对他说:“周参谋长,石友三这个人见钱眼开,他若耍钱,你可全权处理,斟酌着答应。”

周珉回到太原,将此事禀报阎锡山。阎锡山一听,让他拿出这么多钱,就心痒痒不得了,面对众多晋军将领,竟撇着嘴

说:“代表毕竟是代表,一跑到外面去就当起皇帝了。”周珉出力不讨好,感到十分难堪。

此后,阎锡山一直拖着不给钱,石友三派人来催,他也不理。石友三大为光火,拍案大骂:“人人都说阎老高抠门,果然不假。不给钱就想让老子给他卖命,没门。”

后来,阎锡山在众将领的劝说下,不得不掏心

挖肺地给了石友三30万元,石友三才勉强参加了“反蒋联盟”,但心里对阎锡山非常不满。结果,在蒋、阎、冯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候,作为阎冯联军第四路军总司令的石友三,在蒋介石许诺100万军饷的利诱下,立即倒戈,阎锡山背后插了刀子,反戈一击,致使阎冯联军阵脚大乱,很快败北。

其实,不用互相指责,彼此都不仗义。

摘自《龙门阵》

## 名流故事

### 我的大学梦

莫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中考,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蒯黎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12岁,读小学五年级。

失学后,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的同学喧嚷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我的家庭出身是富裕中农,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待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己之力,我们的心都碎了。”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

死亡的到来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枕头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1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天片定药,对我说:“睡吧。”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摘自《武汉晚报》

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18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为您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待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经过连续4年的努力,在21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有一次去农场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亩。就这样,我赢得了部队上下普遍的好感。

1977年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呀,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长里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学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我只是把

## 成功秘诀

[美]艾伦·格林斯潘

备战斗机的数量和预计损耗量,有了这些数据,我就基本上可以算出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了。

接下来我必须找出每种型号的飞机需要多少铝、钢和钢材。我找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进数字、图表和工程专业术语的海洋。渐渐地凌乱的资料中呈现出规律,政府的购买计划变得清晰了。

调查结束后,我写了

表在《经济记录》报上,题目是《空军经济学》。时隔30多年,我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不久,一个曾在五角大楼工作过的同事说:“还记得你写的《空军经济学》吗?你计算出来的数字跟政府保密文件里的数字非常接近,当时吓了我们一大跳,差点就要派秘密警察跟踪你呢!”

如果你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会给你两个答案:“捷径”和“苦干”。1949年的会议记录是“捷径”。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计算整理出各种型号飞机的数据是“苦干”,这两项缺一不可。

摘自《环球时报》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我的左眼是上帝为我蒙上的,就是希望我能专注于我学生的事业,专注于我的目标,执著向前!”

### 上帝替我蒙住了左眼

戈登·布朗出生在苏格兰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从小志向远大。12岁时,布朗就和哥哥约翰说服工党,允许兄弟俩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刊登当时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的一篇文章。

厄运不期而至。高中快毕业时,布朗遭遇变故。在同教师举行的一场橄榄球赛中,他被踢中头部,左眼视网膜脱落。他在医院呆了几个月,双眼均缠上绷带,接受了三次眼部手术,受尽煎熬,最终不得不接受左眼失明的事实。

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来说,失去一只眼睛,何等残忍。那段时间,布朗心灰意冷,躲在那屋子里不出来,讨厌陌生人的蔑视,更憎恶亲朋的同情,从朝气蓬勃变得郁郁寡欢。

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尝试开导劝慰,却毫无收效。

恰好,布朗的哥哥约翰从大学回家休假,千方百计地帮助弟弟走出低谷。一天,他欢天喜地地回到家,找到布朗,塞给他一把手枪和六发子弹。布

### 父亲的绞索套上了我的脖子

贝·布托

1979年4月4日凌晨,我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妮,”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母亲没有作声。“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想是的。”我说。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日期定了吗?”“明天早晨。”监狱长说。“什么时候?”“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父亲看着他。“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